

THE PHILOSOPHICAL
ORIGIN OF
MARXIST
PEOPLE'S VIEW

Karl Marx

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的 哲学溯源

早期马克思人民理性思想研究

余根雄 —————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的哲学溯源：早期马克思人民理性思想研究 / 余根雄著. —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2

ISBN 978-7-5520-3885-9

I. ①马… II. ①余… III. ①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民—主体论—研究 IV. ①A811.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2)第 169864 号

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的哲学溯源 ——早期马克思人民理性思想研究

著 者：余根雄

责任编辑：熊 艳

封面设计：谢定莹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顺昌路 622 号 邮编 200025

电话总机 021-63315947 销售热线 021-53063735

http://www.sassp.cn E-mail: sassp@sassp.cn

照 排：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印 刷：上海景条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 毫米×1010 毫米 1/16

印 张：16.75

字 数：240 千

版 次：2022 年 10 月第 1 版 202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20-3885-9/A·014

定价：8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绪论 / 1

第一章 人民理性思想的历史背景与理论萌芽 / 22

第一节 黑格尔哲学的解体 / 22

第二节 青年黑格尔运动 / 27

第三节 最初的探索——追寻“定在中的自由” / 33

第四节 与“自由人”的决裂 / 38

第二章 《莱茵报》：“人民理性”的诞生地 / 45

第一节 自由报刊是人民的喉舌 / 46

第二节 等级会议制的非人民性 / 50

第三节 违背人民意志的《林木盗窃法》 / 57

第四节 哲学是人民精神的产物 / 62

第三章 “人民理性”的内涵：定义与内在逻辑 / 67

第一节 “人民理性”之定义剖析 / 68

第二节 普遍的自由——“人民理性”的哲学前提 / 74

第三节 现实的精神——“人民理性”的基本内核 / 86

第四节 理性人民性——“人民理性”的理论旨归 / 99

第四章 “人民理性”的外延：四重批判论域 / 112

第一节 宗教的批判 / 112

第二节 伦理—道德的批判 / 120

第三节 法的批判 / 127

第四节 市民社会的批判 / 135

第五章 “人民理性”的唯物史观向度 / 143

第一节 实践的唯物主义是“人民理性”的哲学扬弃 / 144

第二节 阶级理论是“人民理性”的逻辑延伸 / 151

第三节 社会革命是“人民理性”的实践发挥 / 159

第四节 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是“人民理性”的政治诉求 / 167

第五节 “真正的共同体”是“人民理性”的价值追寻 / 174

第六章 “人民理性”的当代对话 / 183

第一节 时代的转折：何为正义 / 184

第二节 新自由主义：走向自由的极端 / 193

第三节 社群主义：权利与善的纠葛 / 201

第四节 共和主义：“民主”的危机 / 209

第七章 “人民理性”的中国意义 / 217

第一节 “人民理性”在中国的历史出场 / 217

第二节 “人民理性”在当代中国的发展 / 223

第三节 “人民理性”对未来中国的关切 / 235

结论 三个问题及反思 / 245

参考文献 / 250

绪 论

当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全面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是马克思主义人民观在新时代中国的具体呈现，其中蕴含着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基本立场和基本方法。因此，若要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的丰富内涵，就必须回到马克思早期人民观形成的思想史中探寻其深邃的理论旨趣。马克思是在其早期的哲学批判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人民观，即人民理性。人民理性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起始概念，也是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的哲学起源。早期马克思人民理性思想的研究对于解决当下马克思主义学界所遇到的理论困境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有所助益。

一、理论困境与现实问题

任何学术性的研究都有其所面临的问题，马克思人民理性思想研究也不例外。研究首要针对的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中所遇到的理论困境。当西方政治哲学研究进入高潮时，马克思主义学者们就会问，马克思是否有其政治哲学。当然，这个问题似乎已不成为问题。首先，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自 20 世纪末已经开始了并取得不少成就。但仅从各著作论文的

影响力来看,却远远不及西方。其次,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话语体系建设也未有突破性进展。这体现为学者仍用西方政治哲学的研究框架和思路来解析马克思的政治哲学相关思想,这必然会陷入西方政治哲学的话语体系中,解读出来的所谓马克思政治哲学也难免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最后,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研究对象、核心观点以及问题域也是学界有待明确的研究前提。可以说,正是因为这些问题的模棱两可才导致了前两个问题的尖锐化。要走出这一困境,则必须对马克思的相关政论进行深入贴切的剖析。

马克思人民理性思想研究针对的另一个理论问题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是与时俱进,时刻走在时代的前列,引领时代精神的方向。要与时俱进就必须创新,理论创新是一切创新的前提。面临当今复杂的社会情势,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切入社会现实中去,解决新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创新的首要任务,这一任务空前艰巨。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扬弃。这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观点、方法与时代问题结合起来,又如何从解决新问题的实践中总结新理论的问题。从目前的形势来看,这一任务仍任重而道远。

对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而言,其使命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时代问题结合起来,开创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的最伟大创新。要让这条创新之路继续走下去,就要用理论去解决中国社会最迫切、最根本、最尖锐的问题。虽然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不少功绩,但某些日益变化、复杂、深固的社会顽疾仍让人们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

马克思人民理性思想研究所针对的现实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全面深化改革所遇到的瓶颈。第一,自中国共产党提出“四个全面”以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了不少成效。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各方面、各领域的制度变革都逐渐触

及了既得利益群体，所带来的问题是：我们如何从社会的根本利益、人民的普遍利益出发，化解、破除这些既得利益群体在改革过程中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如何从根本上改变不适合社会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制度。第二，政治体制改革步履维艰。相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可谓是如履薄冰。政治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在某种意义上，它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政治体制改革的难点在于，一方面要保证维持基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不变，一方面又要去除社会主义制度内不适应社会发展的旧体制。第三，如何处理好改革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改革为了发展，发展依靠改革，但两者又时常会出现困难局面：改革不当会阻碍发展；发展不平衡会影响改革的进程。这也为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提出了新形势下的新挑战。

现实问题的第二个重要方面是如何发展党的先进性问题。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反腐力度空前强大，发现了不少党内的腐败问题，这说明党内的政治生态应继续净化。这包括以下三个问题。第一，如何提高党员的政治觉悟。中国共产党由 9000 多万名党员组成，每一个党员的政治意识决定了党的先进与否。要提高每一个党员的政治觉悟就必须要以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党员意识，让每一个党员成为各行业、各领域的先进者。第二，如何建设党员队伍。如何建设党员队伍的问题就是我们要以何种标准选择党员、培育党员，如何以马克思主义武装党员，如何把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内化为党员自身的素养，如何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动党的先进性建设。第三，如何加强党的领导。这是关系到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问题，也是党如何永葆青春的问题。党的领导要求党时刻走在时代的最前列，时刻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时刻不忘自己的历史使命。那么，问题在于，我们党怎样才能做到以上这三点，从而让人民信服、让自己自信呢？这是党保持永久先进性所必须回答的问题。

二、马克思人民理性思想的相关研究述评

迄今为止,综观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论著,尚未见有一部直接或专门研究马克思人民理性思想的著作,相关论文也寥寥无几。对于学术研究来说出现这种情况通常有两种可能:第一,研究对象本身是个伪命题;第二,相关研究确实尚未得到重视。笔者认为,对于马克思人民理性思想研究基本可以排除第一种情况。因为,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史来看,早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初期,就有学者注意到了“人民理性”“人民精神”“理性人民性”等观念在马克思思想早期的作用。虽说现今还没有一部直接或专门研究马克思人民理性思想的著作,但相关的论述仍可见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换言之,学者们在论述马克思主义相关思想理论时,会提及、涉及马克思人民理性思想。从这些零星的描述中,我们大致可以勾勒出马克思人民理性思想研究的概况。

总的说来,国内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三个领域中涉及马克思人民理性思想的相关论述: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

(一)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相关述评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是随着西方政治思潮的兴起而出现的,它旨在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观点和方法来解决政治领域内的理论与现实问题。这无疑会涉及马克思早期的政治评论。梳理相关文献,可从四个方面来论及马克思人民理性思想。

1. 国家理论

国家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界一致认为,马克思国家理论的萌芽生发于《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的思想

成为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重要来源。在《莱茵报》时期，年轻的马克思尚未摆脱黑格尔哲学的阴影，在对待现实的政治问题时，难免受到黑格尔国家观的束缚，所以，马克思在当时所表达的国家“应该是政治的和法的理性的实现，说明马克思还没有摆脱18世纪启蒙思想家的影响，具有浓厚的黑格尔的国家观的色彩，是一种唯心主义的理性国家观”^①。这句话大体上可以概括马克思《莱茵报》时期的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中的定位。人们总是把这一时期的思想定位成理性国家观或理性主义国家观。一是马克思仍把国家看成观念，并解释为“合乎理性的社会的存在”；二是马克思把现实中的普鲁士国家与国家的观念对立起来；三是马克思的批判仍停留于现实的批判，而未上升到对国家哲学、国家观念的批判；四是马克思仍把构建合乎理性的国家作为其理论目标，并把希望寄托于普鲁士当局。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意味着，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依旧是黑格尔主义者，直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时期，他的立场才有所动摇。这样一来，在理性国家观的统摄下，马克思的人民理性思想也必然定性为唯心主义性质的。虽然，人们在阐述马克思《莱茵报》时期的理性国家观时，极少提到“人民理性”“人民精神”，但从对马克思的相关政论中可以看到，“人民理性”“人民精神”是论证马克思理性主义国家观的实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把“人民理性”当成马克思早期国家观的不成熟的依据，有其一定的道理，但这方面的研究缺少了关键的一点，即“人民理性”的根据及其扬弃，从而也就割裂了理性主义国家观与历史唯物主义国家观的联系。“人民理性”的概念不仅涉及人民与国家的关系，而且还涉及人民自身的现实性，以及理性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只有厘清这两层关系才能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

2. 自由观

马克思自由观的研究为什么会涉及其《莱茵报》时期的思想，以至与“人民理性”产生关联呢？众所周知，自由是启蒙运动的主题，西方的启蒙运动一

① 钟明华：《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5页。

直持续到 19 世纪。可以说,黑格尔是启蒙运动的集大成者,受黑格尔影响的整个德国都离不开启蒙运动的余威,马克思也不例外,毋宁说早期的马克思就是一个启蒙主义者。作为马克思开山之作的《博士论文》的核心就是自由。因此,对马克思自由观的研究必将从青年马克思开始。对《莱茵报》时期马克思自由观的研究可划分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对“虚伪自由主义”的批判的研究。此研究路径是通过论述马克思对普鲁士政府一系列虚伪的、戴着自由的面具的制度的批判来揭示马克思对自由的理解。其中凸显的是报刊自由。报刊是人民理性、人民意志的发声地,报刊自由就意味着人民的自由、意志的自由。二是对自由的普遍性问题的研究。这条研究路径是通过阐明官员的自由与人民的自由的矛盾来表明马克思对自由的理解。在普鲁士现实的政治生活中,马克思发现,政府官员是凌驾于人民之上的,这导致了政府官员的意志是自由的,而人民的意志是受限制的,甚至,政府官员的自由是以牺牲人民的自由为代价的。那么,自由的普遍性与人民,与人民精神到底是什么关系?三是自由与利益之间的关系研究。它的研究路径是通过分析个人自由与私人利益、个人自由与普遍利益的矛盾统一来探究自由的物质基础。马克思在《莱茵报》遇到的自由问题并不是纯粹自由的观念问题,而是具体的现实的自由问题,这与人们的现实生活息息相关,也就与人们的物质利益环环相扣。在分析上述种种关系中,人民理性作为其中的桥梁与中介是联系思维与存在、意识与物质、自由与现实的必要环节。经过以上三方面的研究可得出以下结论,即“一方面马克思坚定地认为自由是人的本质,是一切事物都拥有的本体性属性……自由在个人与国家那里都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与古典自由主义的立场别无二致。但另一方面,马克思强调的自由是所有人的自由,是作为普遍权利的自由,……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的自由观又超越了古典自由主义相对褊狭的视域”^①。

① 周尚君等:《自由的德性:马克思早期法哲学思想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35 页。

马克思自由观的研究中涉及的对“人民理性”的论述倾向于对理性作自由意义上的理解,从而人民理性就代表着人民的普遍自由。可以说,马克思一生的目标都是人的自由。但人民理性并不能与自由完全画等号。自由是人民理性的前提,人民理性是自由的体现。

3. 法哲学研究

法哲学的研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关键领域,它的主要视角是权利、制度、法等,因此也难免关注到马克思《莱茵报》时期的思想。对马克思早期法哲学的研究主要是联系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进行的,也必然会关联到马克思的法哲学思想与德国古典哲学的法哲学思想的关系。研究者认为,就马克思与康德的法哲学关系有三点可以作为比较:一是对实体法学说的相关分类,马克思与康德都把法分为公法与私法;二是对物权的理解,马克思认为物权包括了契约行为,而康德则把两者分开;三是对契约的分类,两者都将契约划分为义务契约、告诫契约和无偿契约。^①就马克思与黑格尔的法哲学关系,有两方面值得关注:一是马克思扬弃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并用辩证法来分析现实的政治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二是和黑格尔一样,马克思也赞同理性国家的伦理属性,把理性国家与人的自由统一起来,并以自由理性的尺度来评价国家制度与法的价值。研究者对马克思早期法哲学思想的总体评价是:它是“以普遍自由为核心的理性法思想,具有传统权利理论的因素,又有明显的自然法思想特点,受德国古典哲学影响,它又根源于康德的绝对自由的理论与黑格尔的法的合理性思想,带有形而上学的普遍特征”^②。可以看到,对马克思早期法哲学研究的主要重心是在德国古典哲学的比较上,并结合当时马克思对现实政治的批判。马克思在没有脱离德国古典理性主义的大的框架内,把焦点聚焦在了生活于困境中的劳苦大众上。把人民权利与私人特权对立起来,为人

① 尹奎杰:《马克思权利观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92页。

② 同上书,第100页。

民辩护。从这一点来看,马克思的内心似乎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坚信国家法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他又看到了现实国家制度的危害性。但这是否可以认定马克思的立场是模糊的呢?抑或说,马克思人民理性思想是脆弱的、不稳定的、隐秘的呢?如果按照马克思早期法哲学研究的结论,马克思人民理性思想与其法哲学思想有内在的一致性,两者都以理性主义为基础,又以现实的人民为关照。但仅从法哲学的角度去看待“人民理性”未免太过狭隘。从具体的论述中,我们确实可以看到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评论的核心问题就是国家的制度、国家的法,但是这也不可否认,马克思有自己的哲学立场,这个哲学立场包括他的世界观立场、政治立场、价值立场等。这些立场仅凭权利或自由等法哲学概念是涵括不了的。总而言之,马克思早期法哲学思想的研究虽然涉及了有关马克思人民理性思想,但不足以全面系统地解释“人民理性”所蕴含的全部意义。

4. 政治批判

马克思的政治批判研究可以看成是前三者的统一。马克思的政治批判研究更加深入地关切马克思的每一篇政论,试图厘清马克思政治思想的来龙去脉。研究的重点集中在马克思对普鲁士政府的批判,尤以以下两个方面为重点:(1)关于普鲁士政府与理性国家的矛盾的分析。通过分析马克思《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一文,阐发了马克思的政治批判精神。研究者认为,“马克思用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国家观来解析私人利益与法的关系,强调公民、个人与国家整体之间的不可分割性。要求国家和法律超脱各等级利益,以实现永恒的正义和普遍理性”。同时又认为,“马克思对利益的内在规定性作用尚也不甚明了,还是寄希望于国家理性”^①。(2)对国家和法的依据的探索。通过研究马克思的《论离婚法草案》《莱比锡总汇报的查封》,试图寻找马克思对国家和法的依据的理解。此研究一般通过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国家行为背后的客观原因;权利现象的市民社会基础;自由是国家政

① 康文龙:《马克思现代性政治批判及其当代价值》,光明日报出版社2008年版,第17—18页。

治生活的必要因素。通过对马克思早期各政论性文章的大量研判,研究者的结论可总结如下:马克思基本探明了人民与普鲁士政府之间的关系,但并没有找到合理的、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和相应的理论依据。马克思在探求国家和法的基础时,谈到了“客观关系”“事实基础”和“本质”的关系,虽然这些关系还不是明确指物质的交往关系以及人的交往关系,但他已开始在当时人表面动机的背后寻找更深刻的原因,为发现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指出了方向。^①马克思的政治批判研究更为深入具体地分析了马克思对每一个国家政治事件的态度和观点,也尝试抽象出马克思政治批判的一般理论,它是最接近于从总体上全面把握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的政治哲学立场的研究路径。在这一研究路径中,研究者们也会关注到马克思对“人民理性”“人民精神”等相关概念的运用。但遗憾的是,研究者们仅把这些关键概念看成马克思用以批判的一般词汇,或借用黑格尔相关概念来表达自己的用意的模糊用语。其中的原因在于,马克思的政治批判研究侧重于马克思对现实与理论的否定一面,缺少了对马克思自身理论的正面阐释,更不用说对马克思《莱茵报》时期的哲学立场作系统全面的分析。

（二）基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的相关述评

除了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视角来研究马克思《莱茵报》时期的思想以外,另一个重要的研究视角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史。此类研究把马克思早期的思想放在整个马克思思想发展史的大背景下,旨在挖掘或证明青年马克思思想的历史地位与思想史意义。就马克思《莱茵报》时期与整个马克思思想的关系而言,可分为以下四种论断,即关联论、对立论、过渡论、阶段论。每一种论断都对马克思《莱茵报》时期的思想进行了提炼与评价,从中我们也可以概括出他们对人民理性思想的态度。

^① 康文龙:《马克思现代性政治批判及其当代价值》,光明日报出版社2008年版,第21页。

1. 关联论

关联论的主要论点在于早期马克思思想与青年黑格尔派有着密切关联，他仍属于青年黑格尔派。大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会把青年马克思与黑格尔的法哲学体系联系起来，并且认为马克思早年的政治批判与黑格尔的法哲学思想一脉相承。他们认为，马克思与黑格尔政治哲学的一贯性体现在以下四点：（1）马克思对离婚法的态度。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为离婚法的正当性进行了辩护，他们一致反对宗教对法律和政治的干预，在此基础上声称宗教不是判定人类社会体制的标准。（2）马克思对舆论自由的态度。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极力为新闻自由和报刊自由辩护，虽然黑格尔对于言论自由有一定程度上的保留，但他还是为意见的自由表达进行了辩护，这也体现出了马克思与黑格尔同属于德国自由主义的立场。（3）对宗教国家的态度。马克思和黑格尔都反对任何形式的宗教国家，他们都反对政教合一的国家体制，并要求宗教解放。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把宗教看成人类精神发展的一个环节。马克思同样认为宗教是人的本质的异化，两者的一致性可见一斑。（4）对法的理性主义的态度。和对理性国家的追求一样，马克思也寻求对国家的法、制度的合理性。“马克思在《莱茵报》期间将法理解作为一种哲学表达。对于1842年的马克思来说，对现实的规划是合乎理性的，这是典型的黑格尔的立场”^①。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向来都把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归于黑格尔哲学的流派当中，甚至有个别学者把马克思的全部思想都作为黑格尔的继承品。再加上《莱茵报》上所使用的黑格尔式的语言，就更能证明马克思的黑格尔倾向。就此来说，“人民理性”是最好的佐证。因为“人民理性”的概念本身就是黑格尔哲学词汇的变体。但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马克思的语言尚未跟上他的思想变革，也就是说，马克思借用了黑格尔的词汇表达了自己的思想。因此，把马克思早期思想归结为黑格

^① [美] 诺曼·莱文：《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对话》，周阳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88页。

尔派实有是偏颇，也会曲解“人民理性”的真实意义。

2. 对立论

对立论指的是将马克思早期思想与其中后期的思想对立起来，并以前者否定后者，或以后者否定前者。这种对立主要分为两个阵营，一个是西方学者阵营；一个是苏联学者阵营。对立论的出现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导火索。从理论方面来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完成标志着马克思有一个与费尔巴哈哲学无比接近的时期，对立论的双方就此来大做文章，从而也牵涉到马克思《莱茵报》时期的历史定位问题。对立论最激烈的讨论是在20世纪80年代，也是苏欧两个阵营对立最尖锐的年代。《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出版后，西欧学者像发现新大陆一样重新发现了马克思。他们认为，真实的马克思是人道主义的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人本学，因而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前的著作都划归于人道主义，《莱茵报》时期也不例外。佩特罗就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开始从事政治著述活动时，即还在创立唯物主义历史观和科学共产主义以前，就捍卫了人道主义思想。马克思在其发表于《莱茵报》的最早的著作中，就维护了在政治上和社会上都备受压抑的群众。”^①由于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看成马克思人道主义的最高峰，马克思《莱茵报》时期的思想就自然成了人道主义的开端。西欧学者把马克思对贫苦大众的同情和辩护理解为一种人道主义情怀的表达。从人本学角度的解释更是把这种人道主义推向了哲学的高度。皮特洛维奇认为：“马克思不仅是一位历史学家，而且也是一位‘人本学家’和‘本体论者’。”^②然而与此同时，苏联学者则对其不以为然，他们要么否定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思想，要么坚持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思想是不成熟的表现。尼·伊·拉宾就指出，马克思的那些人本主义观点对于政治经济学问题来说是无法解决的，并且对哲学是无任何意义的。^③奥伊则尔曼也强调，现代资

①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2页。

② 同上书，第230页。

③ 同上书，第4页。

产阶级所谓的哲学人本学已被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揭穿为毫无哲学根据的概念。^①无论是西欧学者还是苏联学者都把马克思早年的思想与其中晚期的思想割裂开来，并对立起来。这也切断了马克思《莱茵报》时期的政治诉求与他的整个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的关系，从而极大地削弱了马克思思想的伟大影响力。因此，对于马克思人民理性思想的研究来说，对立论是离真相最远的。

3. 过渡论

过渡论是将马克思《莱茵报》时期的思想看成马克思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阶段。这是我国国内绝大部分学者持有的观点，也是马克思主义研究史上最主流的观点。这一观点最早由列宁提出，它明确指出，从马克思在《莱茵报》上的政论性文章就可以看出，马克思已经开始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了。^②这一说法一直沿用至今，并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定论。其主要的论证路径有两条。第一条是否定的路线。研究者认为，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所表现出来的观点，既不完全属于唯心主义也不完全属于唯物主义。一方面，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早已脱离了青年黑格尔组织，且从立场上摆脱了青年黑格尔派的控制；另一方面，马克思还尚未提出任何带有唯物主义性质的概念，甚至还讽刺那些只关注物质利益，以私人利益为唯一动力的资产阶级私人团体为“下流的唯物主义”。由此看来，唯物主义在当时，对于马克思来说贬义多于褒义。第二条是肯定的路线。研究者认为，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所提出的相关概念，既带有唯物主义性质，也带有唯心主义性质，是两者的“混合物”。一方面，马克思在讨论现实的政治问题时，关注到了国家权利与物质利益、私人权利与特殊利益之间的关系，这显然带有唯物主义的视角；另一方面，马克思在谈论上述问题时，又离不开“合理性”“精神的发展”等概念，这又说明了马

①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6页。

② 《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3页。